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运用*

孙 红

（黑龙江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摘要］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以多维视角研究国际次体系区域的安全关系的理论。该理论关注权力，也同样关注制度和身份，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大基础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构成了该理论的三个重要支柱。该理论强调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强调身份使权力产生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机地融合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使得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解释更全面、充分。

［关键词］ 区域安全复合体；物质维度；社会维度；多维运用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1)05-0008-06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在《无政府社会》一书中提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过程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那么，国际体系就出现了”，[1] 换言之，国际体系的形成需要国家间的互动要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相互依存并非对称的相互依存。区域安全复合体反映的是区域层面的国家间安全互动和安全相互依存关系，是在区域范围内微缩化了的国际体系。

巴瑞·布赞将区域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相邻使它们相互间的主要安全关注彼此紧密地相联系，以致它们的国家安全不能现实地被彼此分开加以考虑”。[2]（P.190）可见，区域层次的安全关系即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界定是使之与周围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密切的安全相互依存，包括积极相互依存，也包括消极相互依存。区域安全复合体是“一组国家或者其他行为体必须有着足够的安全相互依存使之成为联系的一组，并使之与周围其他的安全区域相区别”。[3]（P.47-48）作为一种在某一地理范围内具有相对自治性的次体系，区域安全复合体与国际体系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是，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是，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不是对国际体系的一维研究，而是从多维度研究区域体系，这既是对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运用，也体现着物质理论和社会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融汇。“我不后悔把物质理

* 本文系2009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安全体系建构”（项目编号09YJCGJW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系该项目主持人；本文兼系黑龙江科技学院引进人才科研项目“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研究”的成果。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论与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我所持的态度是基础理论多元化。我不拘泥于把某个单一的取向作为‘真理’，而是对任何能够为理解国际体系如何运作提供严谨而系统见识的取向加以关注。”[4](P.X)

一、区域安全复合体结构的物质维度：权力结构

“权力”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权力结构，即“极”，是新现实主义最核心的研究变量，沃尔兹将“极”定义为“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5](P.31)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布赞表现出了对权力和权力结构的高度关注。布赞将权力定义为“单元的行动能力，不同行为单元之间相对的力量对比关系，行为单元的利益及其维护利益的方式，以及结构权力，即系统中权力的排列方式。”[6]布赞对权力的理解是从相对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的。重视权力和权力结构，意味着对大国的关注。定义沃尔兹的体系结构即“极”的，是全球性大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利益,并能有效地行使权力维护其利益的大国”;[7](P.27)在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定义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权力结构的是地区大国——“一些国家拥有相对于该地区这一有限区域来说的普遍利益和独立行事的能力”。[7](P.32)安全复合体中的“极”，作为区域内的大国，因为其较强的互动能力以及权力关系的传导链条而使其周边的小国裹挟到与其相关的安全关系中。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现实主义体现在对“权力”、“极”这样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概念的关注。

布赞认为“权力在区域安全复合体中与在整个世界国际体系中同等重要。”[8]安全问题总是与威胁相伴相随，而权力是应对威胁的首要手段。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对权力的关注还体现在其对有关威胁和脆弱性的分析上。在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时，要同时考虑威胁以及威胁所指向对象的脆弱性。不安全反映出的是威胁和脆弱性的结合，比如，如果说历史上的波兰是不安全的，既要考虑强大的具有扩张性的邻国所带来的威胁，也要分析波兰本身因国家规模、经济的贫弱、政治的动荡、国防的虚弱等因素引起的脆弱性。倘若波兰的邻国德国和俄国是比波兰还要弱的国家的话，或者倘若波兰是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国家，拥有固若金汤的国防，那么，来自俄德的威胁可能也就不那么严重了。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色彩着重体现在该理论将区域权力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变量。国家是一个固定在领土上的有机体，在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具有固定的版图，超级大国、全球性大国也不例外，因此，虽然前文提到了定义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极”的是地区性大国，但是，在某些地区，全球性大国或者超级大国的存在使得区域安全复合体因“极”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的种类：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区域安全复合体以及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超级区域安全复合体）。

1. 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极”是完全由区域性大国来定义的，根据区域内区域性大国的多寡可以分为单极、两极或多极，单极的比如由南非定义极性的南部非洲，两极的比如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定义极性的南亚，多极的比如列国争霸的威斯特伐利亚欧洲。

2. 中心化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心化区域安全复合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超级大国（北美洲的美国）或全球性大国（独联体中的俄罗斯）来定义的单极区域安全复合体。“全球层次大国将主导这个地区（单极），那些本来可以算作地区大国的国家（乌克兰、加拿大、墨西哥）不具备足够的相对力量，因而无法界定另一个地区极”。[9](P.54)另一种是由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整合起来的地区，比如欧盟，二战后欧洲的一体化已经实现了欧洲国家间的去安全化，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欧洲已经有成熟的制度性保证。

3. 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极性也是由全球性的大国来定义的，与由全球性大国或超级大国定义极性的中心化区域安全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复合体不同的是，前者是两极或多极的，比如今天的东亚或者二战前的欧洲，而后者是单极的。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因两个或多个全球性大国存在于同一地区而使得它们之间的安全动力直接影响着全球的力量平衡，比如，二战前的欧洲区域安全动力几乎外溢到全球范围内，这是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不能起到的作用。另外，全球性大国因其权力、利益以及互动关系更广泛而对邻近区域产生了外溢效应，也就是说，较强的区域间安全互动关系即超级区域安全复合体出现了，这意味着由全球性大国定义极性的两极或多极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改变了区域间互动较弱的状况，使得大国安全复合体成为区域层次和全球层次的混合体。[10](P.17)

由权力和权力结构而产生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差异，使得不同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在全球体系层面的安全研究中有了不同的意义：超级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而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的影响则是地区性的，由超级大国或全球性大国定义的单极的中心化区域安全复合体,因为“单极”在地区的绝对主导地位，使得超级大国或全球性大国对其所处的地区内的安全担忧弱化，从而有精力将更多的注意力和权力投入到全球体系层面的竞争中去。

二、区域安全复合体结构的社会维度：身份结构

区域是由政治－军事互动造就的，复合体内的物质权力因素通过构成单元之间的身份结构而发生作用，因此，“在分析地区安全时，必须在地区权力关系中加上国家间的敌对或友善关系模式。”[2](P.189)“在界定地区安全时，除去实力对比关系之外，我们首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国家间的关系模式（友好还是敌对）。”[11](P.191)区域安全模式指的是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极”之间的身份关系模式或“极”与复合体内的其他国家之间的身份关系模式。国家间的身份关系是以友善为一端以敌对为另一端的一个谱系，在二者中间或存在着广泛的中立或者冷漠的态度，或存在着敌对和友善参半的复杂关系。

敌对/友善关系模式的形成源于一系列无法从简单的权力分布而预知的问题，比如边界争端、种族利益、意识形态和历史恩怨等等。敌对/友善关系模式比权力关系模式更加稳定，有深刻历史渊源的敌对关系更是如此。[12](P.143)同一地区内的国家因为地理上的邻近，国家间的互动历史较为漫长，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恩怨绝对不仅仅是老祖宗之间的恩怨，现代国家间关系是在历史恩怨的惯性中开始的，若非历史惯性得到了消弭,国家间的敌对/友善关系模式很难改变。例如，2008年东亚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应用简化版的博加德斯社会距离量表对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的受访者进行调查，得出的东亚各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之间的社会距离中，中国的受访者与日本的社会距离最远,平均值是3.91，同样，日本的受访者与中国的社会距离也最远，平均值是6.27。[13](P.54)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低认同度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以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岛屿和领海的争端等不无关系，这种低认同度也使两国安全关系模式的改变缺乏社会基础。

敌对/友善关系模式反映出的地区安全关系要比权力结构更加清晰、稳定。根据复合体内最主要国家间的敌对/友善关系模式的不同，复合体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冲突结构（敌人）、安全机制结构（竞争对手）、安全共同体结构（朋友），这三种结构与温特在社会建构主义中所描述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文化结构不无相似之处。

1. 冲突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冲突是指“一种矛盾或对立状态的形势”。[14](P.23)冲突模式的复合体内最主要的国家间即“极”之间或“极”与复合体内的大多数国家之间在利益、价值取向和目标上直接对立，具有直接对抗性和结果的零和性。复合体内的“极”之间或者“极”与复合体内其他国家之间倾向于从消极的角度去判断彼此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间的意图，“对于他国给自己造成的威胁，国家总会有深切的体会，但是，它们却意识不到自己给他国构成的威胁。”[11](P.193)在冲突模式的复合体中不存在那种稳定的、得到很好建构的安全制度来管理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模式的复合体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不过，它的和平是通过权力均势来实现的，这种原始的安全机制不能改变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这种地区秩序的典型例子是19世纪的欧洲，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到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欧洲国家间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但这种和平状态靠均势原则来维持，当均势被打破，战争就成为19世纪后半叶欧洲的常态——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随后形成的新均势即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新均势再次被打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冲突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中，权力是维护安全的唯一手段。但是，“如果所有各方都热衷于追求权力，一种战争状态就出现了。如果所有国家都只确保自己的安全，一种战争状态也同样会出现。”[15](P.217)简言之，安全困境和冲突是冲突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常态。

2. 安全机制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罗伯特·杰维斯将安全机制定义为“那些促使国家自我约束行为，并相信其他国家也会如此的原则、规定和规范。”[16](P.357)安全机制模式的复合体内的主要国家之间，利益既不完全协调，又不根本对立。但是，复合体内的国家依据国际通用的以及地区独特的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有着对他者相似行为的假定和期望，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因此而减弱。因为可靠的安全制度在起作用，复合体内的“极”之间或“极”与复合体内的其他国家之间能够对对方的未来行为产生可靠的、积极的预期。复合体内国家间“通过心照不宣地探索解决安全困境的自我行为或通过对其他行为体行动的假设，进而解决它们的争端或避免战争。”[2](P.218)因此，安全机制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内，武力的有效性以及对使用武力的期望都大大降低，复合体内的安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

3. 安全共同体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卡尔·多伊奇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达到一种强烈的和广泛的‘共同体的感觉’、制度和实践，足以保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间有着可靠的在其内部发生和平变革的期望。”[17](P.5)巴瑞·布赞将处于共同体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描述为，“没有哪个国家会恐惧或时刻准备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政治攻击或军事侵略。”[2](P.219)这意味着在共同体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内和平以及和平变革的期望是地区安全关系的基调，运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变得不可想象，比如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关系模式都是如此。在共同体模式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内，安全困境已经被化解。

三、区域安全复合体中的权力、制度与文化

权力、制度与文化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巴瑞·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体现了对三大理论的综合运用，是对国际关系的多维分析研究。

“横看成岭侧成峰”，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条件下的权力结构选择；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制度选择；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角色选择。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则以立体的、多维的角度分析了区域层面的安全关系。

首先，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与现实主义一样重视权力和权力结构，重视大国在复合体结构中“极”的地位以及大国对复合体级别的决定性意义，甚至复合体内的身份结构关系以及制度建构状况都是由大国决定的，比如法德间身份结构的转变带动了欧洲复合体的安全模式的转变，法德两驾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马车共同带动了欧洲复合体区域性制度的建构等等。

其次，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作为一种次体系和国家生存的空间，区域“不是自然给定的东西，而是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发明的社会性建构”。[18](P.9)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强调复合体的形成源于国家间因足够的安全互动而产生的安全相互依存关系。地理上的邻近为国家间产生足够的安全互动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伊朗和巴基斯坦虽为邻国，但相对弱的安全互动使得二者没有把最主要的安全关注放在彼此间，因此，二者并不属于同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互动决定了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互动实践的性质也决定了复合体作为安全次体系的性质，“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可以造就多种无政府逻辑，建构多种无政府文化。”[5](P.187) 布赞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复合体的一个研究变量，整个国际体系可以划分为多个区域安全复合体，每个复合体作为一个次体系，其无政府状态因互动实践的差别而有了成熟无政府与不成熟无政府之别。不成熟无政府处于几近霍布斯式的的混乱状态，比如中东；成熟无政府则处于几近康德式的的和平和互助状态，比如欧盟；处于二者之间的则是介于成熟无政府和不成熟无政府之间的状况，比如东亚。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区域体系的研究变量，而不再将无政府仅仅作为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是有针对性地差别化研究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次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对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建构属性的强调。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将安全模式即敌对 / 友善关系作为与权力结构并重的研究变量，也充分体现了体系身份结构或曰体系文化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最后，大多数复合体的无政府状态既不是完全意义的成熟无政府也不是完全意义的不成熟无政府，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个状态；大多数复合体的安全模式也是如此，既非霍布斯式的敌对也非康德式的友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某个位置。在这种状况下，制度或曰安全机制在复合体的安全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制度的多寡和制度的效力决定了一个复合体在以成熟无政府和不成熟无政府为两端的无政府状态谱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一个复合体在以冲突模式和共同体模式为两端的安全模式谱系中的位置。处于安全机制状态下的安全复合体是以国际组织、国际制度来充当区域政治市场的守夜人，以避免区域政治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从而使复合体呈现稳定的秩序，只有当有效的安全机制保障使复合体内的出现去安全化的时候，区域内国家间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互动才能够改变复合体内的身份结构，比如，作为东亚区域安全复合体的两极，中日之间的安全问题没有有效的安全机制提供管理，中日之间没有实现去安全化，所以，尽管中日互为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但是，中日之间的身份结构并没有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提升而更加靠近国家间身份谱系的友善一端。

小 结

冷战的结束使得原来被两极结构压制的地区安全动力的自在性得以恢复，除了少数超级大国和全球性大国以外，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真正的、现实的安全关注回归到地区层面，因此，以区域为分析层次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恩格斯说，“唯心主义认为非此即彼，除此之外都是鬼话，我们应该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改变了以往国际关系研究中基础理论运用上“非此即彼”的一维视角，而是以多维的视角立体地运用基础国际关系理论来研究安全国际关系，这既可以使理论融会贯通，也使得对安全问题的解释更充分。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参考文献]

[1] 李少军.怎样认识国际体系?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6).

[2]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A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ar. [M]. New York:Harvester-Wheatsheaf, 1991.

[3] Barry Buzan , Ole Wa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 [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M].刘永涛.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5]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Realism vs. Cosmopolitanism: a debate between Barry Buzan and David[EB/OL]. http:// www.irchina.org/xueren/foreign/view.asp?id=195

[7]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M].宋爱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8] [英]巴瑞·布赞.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M].刘德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M].潘忠岐,孙霞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10] 孙红.巴瑞·布赞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探微[D].外交学院2006届硕士论文.

[11] [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M].闫健,李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2] 王帆,卢静.国际安全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13] 王卫东.东亚的社会距离与全球化[J].教学与研究,2010(6).

[14] 何曜.国际关系中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的理论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3(6).

[15] 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6]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spring 36).

[17] Karl W Deutsch, Sidney A. Burre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M]. Princeton,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8]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M].秦亚青,魏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齐琳)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